

本期关注：

七七抗战
纪念

编者按

7月7日是“七七”抗战纪念日,是为纪念国耻“七七”事变而设立。历史昭示,没有强大的国家,民族就难逃任人宰割的命运。我们除了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外,也应该怀念那些不顾生死为保卫河山浴血奋战,奏响反抗侵略的人民英雄。在全民族抗战全面爆发86周年之际,吕梁日报社与市委史志研究室联合推出专刊,再次追忆起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以最崇高的敬意,致敬抗战胜利做出奉献的吕梁英雄儿女,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抗战草根英雄雷步选：

一心向党 一生奉献



解放初期离石县领导干部合影（左起第三排第二为时任五区区委书记雷步选）

多次出色完成了抗敌、袭敌任务。1944年12月在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被授予“晋绥边区甲等民兵英雄”称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6岁的雷步选参加了民兵,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1941年起担任小神头乡民兵中队长,抗日村长。

1943年2月,日伪军100多人进驻离东县归化村,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地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有一次,日本兵又出来抢走了老百姓的两群羊和十几头耕牛,雷步选得到情报后,立即组织了十几位民兵前往归化村,跟敌人展开了斗争。由于当时敌人对地形不是很熟悉,又遇上了誓死要帮老百姓夺回牛羊的民兵,便舍弃了抢来的牛羊逃回了碉堡中。这次战斗民兵毫发无损,还击毙了日军3人。老百姓都高兴地夸“还是老雷和民兵好”。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带领民兵与敌人先后作战 17 次,击毙日军20多人、伪军8人,日军在他们的有力打击下只能狼狈撤离归化村。

1944年,日军要在离东县境内的崖窑湾扫荡,雷

步选得知情报立即带领100名民兵赶往崖窑湾村与该村民兵接上头,他们准备占领山头,抢占有利地形,不料山头早已被敌人所占。被敌人发现后,他们立即撤退,由于当时枪支紧缺,他就把自己的枪给了身边的民兵,只拿了两个手榴弹,随时准备和敌人拼命。敌人发现他们后立即开枪射击追赶,他指挥其他民兵迅速撤离,自己在往山下跑的路上发现了一株圆形小树,繁茂的树枝树叶挡住了整个树干,他机智地爬上去隐蔽起来。敌人在树林里搜寻了一天一夜,还不时用机枪扫射,但始终没抓不到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1944年夏收时节,日军在离东一带到处抢粮,雷步选得知后带领民兵在日军出入的道路上埋设了地雷。他亲自在日军经常出入的路上埋下一颗60斤重的大地雷,日军先头部队在强制群众麦子时绕道而行,但在返回的路上踩响了地雷,一下炸死了五六个日军,其中还有一个小队长。此后日军再也不敢大肆抢粮了,雷步选因此被大家誉为“地雷大王”。1944年12月,他光荣地出席了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被授予“晋绥边区甲等民兵英雄”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步选先后任离石县小神头乡党委书记,离石县驻榆次专区合作办事处副科长,离石县小神头乡党委书记,离石牧场场长等职。职位不断变化,但他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优良品质始终没有变。

2007年12月18日,雷步选带着对亲人、对事业、对吕梁这片热土的无限眷恋永远地走了。雷步选走了,但他的精神和功绩永存,就像巍巍吕梁山一样伫立在人们心中,吕梁父老乡亲将永远怀念他！

抗日县长顾永田：

民族精英 虽死犹生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文水县抗日政府县长的顾永田被文水人民誉为“人民的好县长”。这个称谓从抗日战争传颂至今,人口皆碑,英名永存。

顾永田(1916年-1940年),江苏铜山县西朱家村人。少年时在徐州第一高小和铜山师范学校读书。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成为徐州学生抗日救亡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赴延安学习。同年从延安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任同盟总会执行委员和太原市二区牺盟会特派员。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工卫队)成立后,先后任连指导员、大队教导员。1938年4月任文水县抗日政府县长。1940年1月12日被公选为晋西北行政公署八专署专员。同年2月21日,在交城县田家沟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4岁。

1940年2月21日,在进山“扫荡”的1000余日军

回窜时,顾永田专员亲率一营兵力,在交城山田家沟村附近设伏。战斗中原计划放头打尾,但因匆忙,实施中却打了头,敌后续部队趁机从村后包抄下来,形势对我不利。在敌众我寡危急形势下,二十二团团长,原文水抗日县政府秘书彭敏同志劝他赶快撤离,但他身先士卒誓与战士同生死,继续顽强战斗,奋勇杀敌。拼杀中,他腹部中弹七、八处,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命令警卫员韩锦华,赶快把他的文件包拿走,决不能让党的文件和资料落入敌手,韩锦华同志在头部受伤的情况下,忍痛含泪用积雪和柴禾掩埋住顾专员的尸体,背上顾专员的文件包,与敌友们一起突出敌人的包围。这次战斗虽然毙敌80多人,但是我军也死亡百余人。特别是顾永田同志的牺牲,指战员们个个痛哭不已。

民族精英,虽死犹生。2月22日,八专区党政军民为顾永田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在田家沟山坡上为其立了墓碑。碑文是:“巨星陨落兮,震惊西北;传来噩耗兮,大地哀伤。君为民族自由而战死,君为祖国生存而残伤。革命阵营丧失了青年领袖,日本军阀夺去我社会栋梁。此仇必报兮,誓除日寇;君之大业兮,吾等承担。祝君安息兮,吕梁山畔;一杯黄土兮,万古馨香。史册留芳兮,忠贤宇宙;牺牲壮烈兮,为我民族之荣光。”

张秋林：

抓劳动促生产就是同敌人作斗争

“10万人穿衣,全凭女同志。”这是晋绥边区对广大妇女的高度评价。

在吕梁儿女用献血和生命铸就伟大的吕梁精神的背后,无数的产区妇女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张秋林就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

1919年,张秋林出生在离石县碾碾村(现属柳林)。8岁时跟着母亲学会了纺花。15岁时,嫁到邻村张家庄。1940年,晋绥边区政府派出的抗日工作团来到柳林宣传抗日救亡政策,号召青年报名参加参军上前线,妇女加紧纺花织布做军鞋,支援抗日。在抗日工作团同志的鼓励下,张秋林第一个送自己的丈夫参军去打日本鬼子。同时她被迫为村妇女生产小组长,妇女演剧队队长、行政村妇救会组织委员。

1941年,张秋林经过不断努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担任了乡政府妇救会秘书。尽管任务更加繁重了,但她白天在外面做妇女工作,晚上赶回来在煤油灯昏暗的灯光下继续纺花织布。1943年,边区政府号召广大妇女织标准布以便于工厂加工军装,要求织得快,还必须合乎标准。张秋林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为做好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张秋林先和本村的两个妇女干部、两个妇救会会员,组成一个纺织小组,然后将全行政村的妇女按照居住远近、年龄大小、性格脾气自由组合成25个纺织小组,开展纺花织布。她不但自己纺、亲自教,而且还发动妇女互相竞赛,提高纺

织质量,整个纺织运动搞得红红火火。这年冬天,她在晋绥边区群英会上被一致推举为特等劳动英雄第一名。

群英会后,张秋林回到村里,立即开始筹备合作社的事情。她东家出西家进,耐心细致地做妇女们的工作。没有几天时间,仅在两个村就集下20000多元,一个月时间里,她在十几个自然村发展了160个社员,集下63000元。同时,县政府又借给10000元做垫底。1944年5月29日,合作社在两孔窑洞里正式成立,定名为“秋林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后,张秋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4年8月的一天,她到碛口为合作社购买织布机,9岁的儿子不幸被“扫荡”的日本鬼子杀害。然而残酷的打击并没有把张秋林击倒,在万分悲痛中,她对前来安徽的干部群众说:“为群众服务就是为孩子报仇,搞好合作社就是同敌人在经济上作斗争。”于是她擦干眼泪继续为群众办实事。这一年,合作社的红利占到股本的60%。妇女们得到收益,更加信任合作社了,入股的人更多了,入股社员达到360人,股本增加到30余万元。

1944年秋冰剧社编写、排演的大型川剧《张秋林》,在晋绥边区广为传唱。当年,她再一次出席了晋绥边区群英会,又被选为特等妇女劳动英雄第一名。1949年3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受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抗日英雄蒋三：

扑不灭的火焰



蒋三,原名叫蒋万寿,在弟兄中排行第三,人们都叫他蒋三,1913年出生在汾阳县唐兴庄村。

1938年初,日军侵占汾阳后,26岁的蒋三目睹日寇暴行,愤恨难平,参加了县游击大队,带领游击队员在汾阳、文水和平遥一带,埋地雷、撬铁道、剪电线、伏击小股敌人,狠狠地打击日本鬼子。

在汾阳城东一带,有三个死心塌地给鬼子充当走狗的狗汉奸,民众称他们为“三根筋”。有一天,蒋三写了一封密信,内称:“……三同志,最近搞出的三箱子弹和八支步枪,已经安全收到,我代表平川游击队表示谢意,望你们注意隐蔽,多为抗日救亡做贡献!”署名是蒋三。几天以后,这封信传送到日军山口司令的桌子上,过了几天,蒋三又写了第二封密信:“……三同志,前去一信,想已收到。今接上级指示,需要尽快摸清鬼子大营盘的兵力和布防情况……”这封信当然也很快被日军“查获”。山口气得暴跳如雷,当即下令,把这“三根

地雷大王李有年：

自制地雷 抗击敌寇



李有年1919年出生在兴县甘里铺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1岁就给地主揽工放羊,一家人过着食不饱肚、衣不遮体的生活。1937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候仁的教

育影响下,李有年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有了自己的追求。1939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甘里铺行政村的第一任民兵中队长。1941年9月,日本侵略军“扫荡”,路经甘里铺村,将李有年的父亲当胸一枪打死,烧毁房屋30多间,杀害百姓13人。

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李有年,把所有的心思和浑身的劲头都用在了消灭日寇和保家为民的伟大事业上。有一天,李有年从边区武委会领回10个地雷,他心里琢磨,10个地雷能抵多大事?于是他找到当时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王来喜商量,从解剖地雷、手榴弹入手,花了很多功夫与心思去研究,经过多次琢磨、反复改进,土法制作地雷终于研制成功。

高凤鸣：

自古英雄出少年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村口总会发现一些小孩在村口或放羊或者爬在树上,看似漫不经心,眼睛却紧紧地盯着村口,机警地看是否有生人进村,这帮小孩就是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在全民抗日时期,涌现出了一批的少年英雄,他们靠自己的聪明勇敢为抗日做出自己地贡献。在山西柳林县成家庄镇南焉村,身为儿童团团长的高凤鸣每天的任务就是组织全村儿童在当村楼坎洞口站岗放哨,监视入村的生人,防止汉奸、特务捣乱破坏。

抗日儿童团是1938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成立的7岁至14岁儿童参加的群众组织。在1938年2月,日军侵占离石以后,分三路向大武、碛口、柳林奔袭,离石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当年4月的一天,三区区委书记贺明华和张智贤,任树荣在南焉村宣传抗日救国,并组建了南焉村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当年仅7岁的高凤鸣决定成为儿童团团员,并积极组织动员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加入儿童团。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高凤鸣家在村西最低处,紧挨荒坡枣林,撤离比较方便,因此有些会议就在高凤鸣家开,开会的时候,放哨的任务就交给了高凤鸣,站在大门外

开明士绅牛友兰：

捐献巨资 支持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遵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把地方士绅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之一,在各级政权中坚持“三三制”原则。以牛友兰为代表的兴县士绅主动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在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牛友兰,名 照芝(1883-1948),兴县蔡家崖人,晋西北富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毅然纾难,支援抗日战争,先后拿出

3500多元白银,150多石粮食,支援八路军和新军抗日日寇。同时,在兴县城关创办了产棉合作社,随后发展成晋西北纺织厂,担任经理,为晋西北军民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同时,把自己的子女和直系亲属都送到延安学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牛友兰先后为国捐资3500元白银,捐赠150多石(一石相当于300斤),捐赠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种生活用品不计其数。1937年冬,牛友兰分家时,所得资产不过3万银圆(包括房产、土地在内),在抗日战争时期,牛友兰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当拿出,支援了抗日救亡运动。这种倾家荡产,为国捐资,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晋西北军民

留下极深的印象。

至今,人们谈起晋西北的抗日战争来,都说:“牛友兰给我们的支持是巨大的。”抗战初期,晋西北地区交通闭塞,四面受敌,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晋西北军民在生产生活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兴县县长张干丞委托牛友兰先生在“复伙永”商店的基础上,创办产棉合作社。牛友兰欣然领命,自己拿出一万元白银作为产棉合作社的資金。产棉合作社创办以后,分设了营业部和生产部。营业部主要经销晋西北军民急需的土布、棉花、食盐、煤油等土特产品;生产部主要是组织群众开展纺花织布,后来发展成蔚汾纺织厂。1940年,蔚汾纺织厂改名为晋西北纺织厂,由晋西北行政公署建设处直接领导,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了办好纺织厂,牛友兰派人至延安难民工厂学习纺织技术;从延安购回省力弹花机,更新了部分纺织设备,扩大了生产范围,后来发展成晋西北最大的纺织厂。

牛友兰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于是他把自己一切希望寄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部队身上。1938年至1942年,牛友兰先后将自己的9个子女亲手送到革命阵营,让他们走上了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康庄大道。除此以外,牛友兰还把他的侄儿牛荫超、侄孙女牛荫芝、牛联根、牛晋秀先后保送到革命队伍,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牛友兰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于是他把自己一切希望寄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部队身上。1938年至1942年,牛友兰先后将自己的9个子女亲手送到革命阵营,让他们走上了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康庄大道。除此以外,牛友兰还把他的侄儿牛荫超、侄孙女牛荫芝、牛联根、牛晋秀先后保送到革命队伍,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3年秋,驻守在岚县的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一天傍晚,120师侦察员配合李有年率领的十几个民兵,在通往敌人据点的大道上埋下310多颗地雷,上面撒上千土和羊粪,并在村里的路口、门口和门顶上或埋或挂了不少地雷,将群众及粮食、牲畜都转移了出去,只留下一个布有地雷阵的空村子。次日天刚亮,300多日军顺着公路向兴县方向扑来。说也怪,这次敌人出动,前面有工兵一路探雷,发现可疑的地方,就用石灰画上圆圈,结果,路上、门口划了许多白灰圈,连一个地雷也没响,鬼子兵俱怕进村吃亏,于是就直扑县城。甘里铺村是兴岚公路上的“咽喉”所在,把好这一关口对防御敌人的突然袭击,保卫晋绥边区首脑机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县委及一区委给李有年和他带领的民兵们的任务是负责瞭望、传递信息和地雷阻击来犯之敌。李有年把瞭望哨放到甘里铺,结果日军被李有年拉响的连环雷炸死炸伤27人。

1944年,李有年带领民兵凭借手中的“土武器”,多次同敌人英勇作战,取得了驰名边区的大胜利,“地雷大王”的诨名和他的事迹也从此在晋绥根据地传开了。当年他光荣地出席了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被授予“民兵爆炸英雄”称号,荣获了一面锦旗、一支“七九”步枪、500发子弹的奖励。1946年7月,他还被边区评为“一等参战模范”。

东边的地圪都上,高凤鸣眼睛一刻也不敢松懈,一旦发生生人和伪村长,他立刻捡起石头往院子里扔,让开会的人及时的疏散。后来村与村栽上了“消息树”,所谓消息树,就是找一个能到远处敌人动静地方,立一棵假树。远看是棵树,敌人不会注意。村里有人在那里站岗,看到敌人出动要到根据地扫荡时,就把假树放倒。村里人看到树倒了,就知道敌人来了,儿童团就又增加了照着“消息树”的任务。再后来,儿童团担负起了更为重要的送“鸡毛信”的任务,抗战时期多以村为单位传递鸡毛信,信封上没有邮戳,也没有公章,鸡毛信的紧急程度分为一般、急件、特急三种。一根鸡毛为一般,两根鸡毛为急件,遇三根鸡毛的信件表示需要连夜火速转运。鸡毛信这种情报传递形式在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高凤鸣就给王存宝、李寅送过两次信。

在1942年冬天,区青委根据南焉的优抗事实,编排了歌剧《优抗》,经区里审查后,分别在成家庄、孟门、南沟、招贤、碛口、王家沟、南凹、刘家山、吉家塔等古镇、大村演出了几十场,受到上级的好评和奖励,群众的热烈欢迎。南焉的优抗工作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认可和肯定。1942年冬天,高凤鸣以优抗模范儿童,先后出席了区、县召开的群英大会,会后,高凤鸣由任家山、王家沟、南凹、碾焉等七个村的儿童团选为行政村营长。